

士

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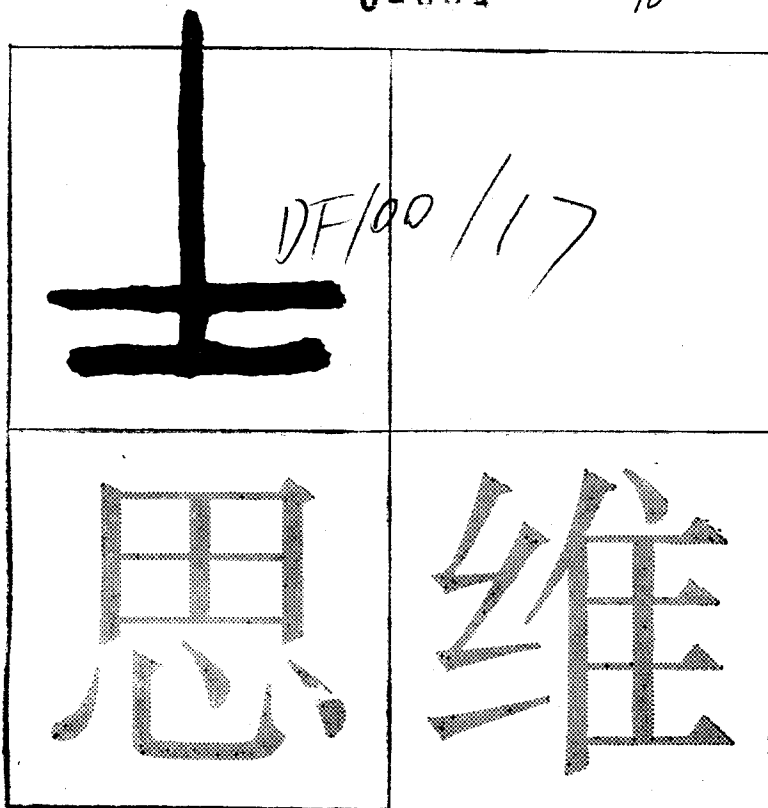
冯必扬 孙霞 赵长林 元方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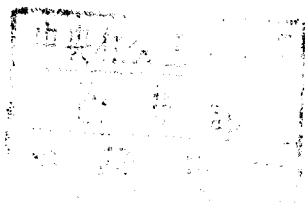
84934

B842.5

10



冯必扬 孙霞 赵长林 元方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李卫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封面封底形拓	高龙、

士思维

冯必扬 孙霞 著
赵长林 元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1483-3/B·183

定价 4.65元

DF/100 / 17
前言

张桂岳

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而且以睿智聪慧名闻于天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继承传统思维的优秀成分以溶于时代精神之中，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应当是唯物辩证和历史具体的。尤其是对漫漫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既要研究代表民族精萃、合乎历史潮流的优秀思维，也要研究对中华民族优秀思维、对历史发展起腐蚀和阻碍作用的衰败思维。对各色人等由其社会经济政治和职业地位所决定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既要宏观鸟瞰，又要着力微观刻意，具体地剖析具体的阶级、阶层和人物的思维特征，从中吸取思维经验。诸如象征封建统治的帝王思维、特权思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意识的士(知识分子)思维及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业家思维等。他们的思维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深刻地显示中国人思维的传统特色，影响深广，很值得我们研究。本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石城

目 录

前 言.....	张桂岳
----------	-----

第一章 士——中国的悲剧角色.....	1
---------------------	---

一、历史使命感：自觉背负的十字架.....	1
二、哀莫甚于此：主体意识的泯灭.....	9
三、从道与从势：两难选择.....	19
四、依附与独立：灵与肉的交战.....	29

第二章 士之魂——民族的先觉和良心.....	39
------------------------	----

一、“以天下为己任”——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39
二、“士志于道”——价值取向.....	48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忧患意识.....	60
四、“胸中磨损斩邪刀”——批判意识.....	67

第三章 士之思维模式.....	77
-----------------	----

一、尊经法古与封闭性.....	77
二、默识心通与直观性.....	84
三、中庸之道与求同性.....	94

第四章 思维观念的倾斜.....	101
------------------	-----

一、重人事轻自然.....	101
二、重仕途轻学问.....	108

三、重义轻利·····	113
第五章 走向近代的思维之旅·····	119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历史角色的迷失·····	119
二、文化上的两难选择：东方与西方·····	125
三、移接西学的思维操作·····	132
后 记·····	142

第一章 士——中国的悲剧角色

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精英。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他们的创造。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丰碑上，凝聚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心血；在我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都有他们的参与和奋争；他们的精神和品格直接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品格；他们的思维和观念不仅影响着周围的人们，而且不少已积淀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他们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然而，正如一个外国学者所说，“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不幸的”。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特别残酷而久远的社会里，士的不幸就更为突出了。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象我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数千年这样长的坎坷和磨难；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象我国知识分子经受这样剧烈的心灵和肉体的搏击，思想和情感的痛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无法理解的牺牲精神和无法体味的灵魂煎熬。

一、历史使命感：自觉背负的十字架

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是我国士阶层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为积极入世精神。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看成

是自己的份内事，把“治国平天下”当作自己的崇高追求。大多数士子文人具有积极入世精神，抱着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统治者所赏识者，就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涌现出象管仲、诸葛亮、魏征、包拯等一大批名相贤臣；遭统治者贬谪者，忠君报国之志不移，屈原被流放，还作诗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①司马迁遭宫刑，仍“隐忍苟活”，写成了不朽之作——《史记》。

士阶层的这种历史使命感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南宋时期，金兵不断南侵，涌现了象岳飞这样的著名爱国将领。当时的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等也都积极投身到抗金的战争中。留下千古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狱中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正气歌》。在清兵侵犯中原的时候，涌现了象才华横溢、年仅17岁的夏完淳等民族英雄。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的欺凌和掠夺，爱国志士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涌现了象林则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邹容、陈天华等著名爱国之士。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生存，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充分体现了士阶层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勇于献身精神。他们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可歌可泣，为整个民族树立了典范！

我国士阶层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积极入

① 《离骚》。

② 《论语·卫灵公》。

世精神，主要在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士阶层形成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国文人士作为—个阶层大约形成于西周末年。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割据，天下大乱，战火连绵。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摆在各阶层面前的首先是这个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士阶层作为民族的精英，对社会问题自然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当时的各诸侯国出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争相养士、广邀天下之士为自己服务。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恒公就邀请了80多人作为他的顾问。他说：我“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由于客观环境的需要和主观忧患意识的驱使，再加上各国诸侯的赏识，因此当时的文人士们纷纷投入政治旋流之中，有的根据自己的理想提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创立自己的学派；有的投入君王的怀抱，充当幕僚，为其出谋划策；有的投笔从戎，指挥或参加诸侯争战；有的作为外交使节游说各国，合纵连横。其中，涌现了象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大家；管仲、商鞅这样的政治家；孙武、孙臆、吴起这样的军事家；张仪、苏秦这样的外交家。正是由于士阶层形成于天下大乱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才使他们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第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正如梁启超所说：当时“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条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①在这百家争鸣中，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中尤以儒、道、法三家

^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占优势，成为后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占了主导地位。儒、道、法尽管差别很大，但都是政治伦理型文化，其中儒家因其政治伦理思想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它才能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如果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神学”、印度的佛教文化是“鬼学”的话，那么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所强调的是人际关系，论述的主要是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拿儒家文化来说吧，就是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人学”。孔孟都主张士要积极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孔子就当过鲁国的司寇。孟子曾自夸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①在孔孟的观念中，脑力劳动者就是治人者，孔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认为“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士应该从事的事业。而“治物”则是下乘的小术，是那些劳力者所干的事。他曾责骂想“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截了当地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当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士就应该辅助帝王，为君主制定治国方略。代圣人立言，为帝王之师，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儒家的这些思想和追求，对后代的儒生学子影响极大，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有多少学子带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迷恋于功名利禄！

儒家文化提倡积极入世精神，要求士子文人关心现实社会，从而使我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自觉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又有着道家思想的深

^① 《孟子·公孙丑下》。

刻影响。道家提倡消极遁世，倡导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纵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自然之中。老子要人们“无为”，庄子鼓吹“忘己”，“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①要求人们“不知说生，不知恶死。”^②象这样一种理论恐怕很难说有积极入世精神吧？！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儒道是互补关系。当入世受挫，遭到统治者排挤、打击之际，或者当世道混乱，而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这些文人学士就由入世转为遁世，由遵循孔孟之道转为崇尚老庄之学。如果把儒家比喻为士子文人在大海中航行的云帆，那么道家就是其避风港，封建士大夫们正是由于有道学作为儒学的补充，才会有进退自如的政治观，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才使他们在宦海沉浮中保持心理平衡，才使他们既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又不致于被历史使命感所压垮。也正由于此，我国古代士大夫象屈原那样自沉于汨罗江的极为罕见，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以通达乐观的姿态迎接命运的各种挑战。

第三，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

与儒家学说相呼应的科举取士制度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士大夫的积极入世精神。我国从隋唐开始就有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帝王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定期举办科举考试，其目的有二。其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为其补充新鲜血液，以保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活力和官僚队伍的更新。其二是笼络天下人才，防止那些有才学之人反叛朝廷、聚众造反。唐太宗在看到一个个儒生争相参加科举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真乃一语道破天机。统治

① 《庄子·天地》。

② 《庄子·大宗师》。

者的这一招确实厉害。在科举制度下，文人学士“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而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①在朝廷功名利禄的引诱之下，再加上儒家固有的入世精神，当时的学校不管是公学还是私学，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其宗旨，所教学的内容也是些《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整个社会也把登科入仕看成是很荣耀的事，如果那个儒生中了举人甚或中了状元，那不仅光宗耀祖，也使四邻乡里生辉。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了登科入仕是正途的价值观。以致于一个个儒生学子“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②

士阶层形成时的社会环境、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以及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就使得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的入世精神。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的入世精神，这应该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才使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品格，我国知识分子才会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畏横逆，愈是在挫折厄运面前，愈能激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才会有深沉的战斗，坚韧的探索和持久的忍耐。

然而，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积极入世精神又正是构成我国知识分子悲剧的要素之一。这种悲剧不仅表现在士阶层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所造成的种种不幸和悲哀：在数千年

① 《校邠庐抗议·变科举议》。

② 《学校篇》上。

政治风云的漩涡中，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流放于边远荒野之地，有多少士大夫碎身于政治斗争的倾轧之中，又有多少仁人志士牺牲于统治者的屠刀之下！而且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唯一的通道是做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达的国家，只有做官才能参与国家管理。平民百姓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是不允许干预政治的。因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成了中国人的信条。这样，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所谓入世就等于做官，这就使得多少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一个个为了获得一顶乌纱帽，穷经皓首，无暇他顾；为了保住这顶乌纱帽向统治者摧眉折腰，竭尽忠诚，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玩物，这正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

其次，由于士阶层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治国平天下”上，迷恋于仕途，因而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重视的是人文学科，而轻视自然科学。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本不乏科学精神，墨家、名家等学派都重视“技艺”，但在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却形成了一个极为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鄙薄“技艺”。在这种“重道轻艺”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也不过是“器”、是“艺”，懂不懂得无所谓只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才是最有价值的学问。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无论多么高明、有多大贡献的科学家，也只能在史书未编的“方技传”中留下几笔，而不能与“儒林”、“道学”先生为伍。这种对科学技术公开蔑视的态度，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用他们的战舰大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封建顽固派仍指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不愿学习。洋务运动时，京师同文馆要设立

天文算学馆,那些腐儒们仍以“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为由,加以反对。

鄙视科学技术造成了我国古代的畸形状态:人文学科的有关书籍汗牛充栋,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却为数很少;拥有文化知识的儒生学士很少以全副精力去研究自然科学,有关科技知识只掌握在一班“匠人”手中;技艺工巧异常繁荣发达,“四大发明”为举世推崇,手工艺品直到今天仍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但总是停留在感性的实践经验阶段,形成不了科学公理。试想如果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从迷恋于仕途,转变为迷恋于科学,那么凭中国人的智慧、勤劳和勇敢,我国近代的自然科学怎么会大大落后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又怎么能够那么肆无忌惮地掠夺我财富、欺凌我人民,宰割我国土?我国近代史的沉痛悲剧说明:知识分子迷恋于仕途,鄙视科学技术,其结果不仅国不能治,天下不得太平,而且国土难保,民族难存!

第三,士阶层所背负的历史使命感这一十字架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因为我国士大夫们所谓的历史使命感是以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巩固既定的封建政治秩序为己任的,因此,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刚形成阶段和上升时期,这种历史使命感还有其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历史使命感就只有消极意义了。因为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种制度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已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士大夫们还顽固而盲目地站在统治集团所认可的基本价值观立场上,以一流的头脑和满腔的热情去为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奋斗,为腐朽的反动王朝卖命,这不是一种悲剧吗?只要看一看我国各个封建王朝灭亡前的那些志士仁人为挽救这个

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行为，我们在深深的敬意之余，不觉得他们太愚腐可悲了吗？因为他们所执着追求的，他们所誓死捍卫的，他们所为之牺牲自己一切的东西，恰恰是罪恶的、腐朽的、应该进入坟墓的东西。这种已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王朝和封建制度，破坏它比维护它更符合理性，更有意义。因为破坏它可以加速它的消亡，尽早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而维护它只能延长它的死期，延缓历史的进程，阻碍社会进步！我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那么长时间，而且一直没有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这与我国的士阶层在政治导向上同统治集团合为一体，共同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在基本价值观上没有提出反叛性意见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不仅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反而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障碍机制之一，这正是士阶层历史使命感的真正悲剧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使命感对知识分子来说本不是坏事，它是知识分子重要品质之一，是他们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有历史使命感。问题是在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走向腐朽之时，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观仍与统治者相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历史使命感就被“异化”了，就是一种悲剧！

二、哀莫甚于此：主体意识的混灭

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认识和行动的主体，由此而产生独立认识和行动的意志。它的特点是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知识分

子恰恰没有主体意识。他们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按理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最为敏感、最富有创造力的人。尊重自己的意志、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本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观。而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却与之相反,他们不是积极肯定自我,而是竭力否定自我,拼命抑制自我,将自我或消融于封建秩序之中或消融于自然环境之中。这正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所在,也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缺乏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最终不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他人或外在性的力量负责。个人不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而必须由尊卑名分来规定和由他人进行定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学子们在思考自我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人就是面对自己,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做一个人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去“做”出好的行为举止。这样,在封建士大夫身上“是”一个人与“做”一个人是相背离的。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人比“是”一个人更重要,他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愿去说、去做,而是根据社会所规定的尺度、根据他人可能作出的评价去说去做,他们往往在“人言可畏”、要“对得起人”、要“留清白在人间”、不要“忘恩负义”、“招人物议”、不能“丢人”等训诫去言行。例如,东晋成帝年间,苏峻谋反,钟雅率兵去平叛,打了败仗,只好带兵回京城保卫成帝。有人劝他逃走保命。钟雅说:“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②不久,他就被苏峻杀害,以身殉职。看来钟雅并非不想活命,并非没有办法来保全性命,也并非是非那种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来

^② 《晋书·列传第四十》。

保卫君王之辈，他之所以不逃走，是惧怕象董狐那样秉笔直书的史官记下自己弃君逃命的丑行。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缺乏主体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个性被压抑。按人的本性来说，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宇宙。随着自我意识的萌芽和成长，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只有他自己才有的眼睛和耳朵，用它去观察外界的千姿百态，去倾听外界的各种声音，从而产生各不相同的精神活动，这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所在。而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我国的知识分子的个性却一直遭受压抑。他们将个人纳入规范，将个性消溶在普遍之中。他们不敢肯定人的个性，凡事都要以先人或他人的是非为是非。“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持者。”^①结果是扼杀个性，扼杀创造力，一个个知识分子都自觉地扮演起类型化角色，并且用这种角色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就拿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来说吧，他率领岳家军去抗击金兵，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连金兵统帅也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这样一位“笑谈渴饮匈奴血”的伟丈夫却终于违心地接受了那来自朝廷的十二道金牌，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这正是他缺乏主体意识，自觉扮演类型化角色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只要他敢于自我负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那么他完全可以对那十二道金牌置之不理，因为他至少可以作出三种名正言顺的选择：第一种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不听命，继续抗金；第二种是：打着“徽、钦二帝”的幌子，坚持“救驾”，正大光明地杀退金兵，收复失地；第三种是：联合两河流域的豪杰、民军，组成抗金义军。这三种选择都可以达到既不理那十二道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页。